



▲王会悟。(翻拍)



▲南湖革命纪念馆。



▲南湖渡口处,石坊上还拥有“毛泽东万岁”的模糊字样。



◀按一定比例仿制的南湖“一大”游船模型。

▼后来仿制的“一大”游船。(翻拍)



13名代表在一条游船上创造了一段无法预测的历史,但对他们个人——

上了船,未必就是一生

撰文/片 本报记者 任鹏

当理论的水流入政治的渠道里时,共产党的建立就是水到渠成了。1921年,就是那样。

因为年轻,“一大”会议上那些激烈的争论,在隔了90年后,依然从嘉兴南湖湖面上清晰传来:“共产党员能做官吗?能——不能——”

在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人相信星星之火真的可以燎原。但历史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给代表们开了一个大的玩笑。

那艘船是王会悟让鸳

旅旅馆账房先生给的。那是一艘丝网船,属于中号,长约16米,宽3米。船头宽平,船中间有一个大舱,大舱后面是一个小房间,放得下一张铺,上面有漂亮的席枕。

现在它的模型,安放在了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入口处。

还得回到1921年8月初,具体是哪一天,现在都已不可考。只知道那天早上9点左右,从上海乘坐早班火车赶到嘉兴的“一大”代表们,来到城内张家弄的鸳湖旅馆落脚。早到的王会悟订了两个房间,让他们洗脸吃饭。张家弄原是条小弄,石板路面,长约300米,宽仅数尺,在那里,这里是服务行业的中心,戏院、茶楼、酒肆、浴室一应俱全。

鸳湖旅馆是当时比较讲究的客栈,前后两进房子,中间铺方砖的天井上盖着个玻璃天窗,旅馆的客房用“福、禄、寿、禧……”等字样依次编排。

可惜这一切如今都已找不到,记者去时,张

家弄早已拓宽为马路,鸳湖旅馆也荡然无存。倒是制作的复原模型放在纪念馆的二楼。

那天,王会悟挺开心,她雇了一天的船,船费才4元5角,细心的她还准备好中午的一桌酒菜,连小费共花了8块银元。

那天,是“一大”会议的最后一天。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到船上开会时已经快11点。他们由王会悟带领,坐摆渡船到湖心岛,再由小拖梢船接上游船。

在那艘飘摇的游船上,他们将完成在上海未竟的议程。

90年后的现在,一艘仿制的“丝网船”正静静地停在湖心岛岸边。

一切都与90年前相似,船舱内依旧放着一只烟榻,上面挂有四扇玻璃挂屏。旁边有一张八仙桌,还有凳子。在这艘根据王会悟和董必武回忆仿造的船里,缺少的只是那压抑的口号声。

90年前,“一大”代表们以游湖为名,也是让船主把船泊在烟雨楼东南方向僻静的水域,有二百米远。

就是眼前这个模样,这个距离。时空转换——

那天的中午,代表们就是挤在这张八仙桌上吃饭。桌上放了一个圆台面,十几个人吃饭也不拥挤。

王会悟没有一道吃午饭。“我一个人坐在船头上。”

那天的湖面上很热闹。五条船中,有一只是城内商户为儿子办满月酒雇的,另一只是乡下土财携眷进城游玩的,到处有留声机唱戏。

王会悟带了一副麻将摊放在代表的桌子上,以做掩饰。

坐在船头的她,感觉不对劲了,就敲敲船舷。船舱内立刻会响起麻将碰撞的声音……

那个下午,代表们讨论了事先起草好的宣言,大约1000字,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信念和立场。

他们离开游船时,湖面上已经是暮霭沉沉。

女校里住进男代表

去嘉兴,也是无奈之举。

“一大”原本在上海召开,可就在最后几天,代表们遭遇了最危险的经历。这距离他们住进上海私立博文女校还不到10天。

王会悟对这次经历非常清楚,代表们在上海的住所,就是她安排的。

1921年6月底,王会悟和李达新婚才两个多月。那年她23岁。

作为一个出身书香门第,求学女校的进步新女性,“五四运动”后王会悟便只身前往新思想弥漫的上海。

在她的同窗中,有一位是茅盾。按辈分,王会悟还是茅盾的表姑。

在中华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的那年,王会悟邂逅了李达。

进步的王会悟自然熟悉丈夫所做的事情。她见了来到上海的毛泽东等十多人,把他们安排在博文女校住下。

安排代表们的住宿、会址等会务是丈夫交代的任务,这种事情,自然还是女子做比较好。

之所以选定博文女校,是因为王会悟和校长黄绍兰熟识,女校放假了,也有空余的房间。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要开研讨会为名,王会悟租下教室。

博文女校是幢青红砖相间的两层楼房,王会悟买来草席,铺在第二进二楼教室地板上,代表们席地而睡。

不过,开会的地点又成了难题。在女学校里开会当然方便,但两个外国人和一群男客出入女校,很容易引起密探的注意。

1921年7月23日是周六,天渐渐黑了下来。

法租界望志路当时是条闹中取静的马路。暮色里,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里,闪进十几个黑影。

这幢房子是李汉俊的兄长、同盟会元老李书城故居。李书城不在上海,这里离女校又近,便被选作开会场所。

90年后的2011年3月23日,这栋二层小楼被脚手架和绿色的纱网完全遮挡。房子早已被辟为“一大”会址纪念馆,为了纪念建党90周年正在修缮,暂不对外开放。

隐约透过绿纱网,倒是能分清正门和后门。当年,王会悟就是在这里,一次次打开门,把代表们迎入一楼最大的房间。

会议很随便,先来的先生,不讲究座次排序。王会悟在门口放风,监视可疑情况。

陈独秀、李大钊同时缺席给了张国焘一个绝好的机会。24岁的张国焘展现了他的交际能力,在预备会上被推选为主席,主持大会。他提出三项议题: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

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

7月30日晚,天气闷热,雨却怎么也下不来。

一个陌生男子从那扇虚掩的后门闪出,狐疑地朝会场环视。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说。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回答。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哈着腰,匆匆退出。

国际代表马林是个机警的人,他认定这个人是个“包打听”,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头散开。

果然,不到十分钟,几个中法侦探,全副武装的法国兵和翻译便闯了进来。横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

密探是如何知道这里聚集了“危险思想”分子的呢?这和接受共产国际委派到中国帮助建党的马林有关系。

这个出生在荷兰职员家庭的“赤色分子”来头很大,是共产国际“二大”执委会委员,来中国后被秘密监视。

翻箱倒柜足足检查了两个钟头,也没有发现什么。

“看藏书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

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临走前,法国侦探微笑着对陈公博讲。

陈独秀拿不定主意,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

“可以到南湖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旁边娇小的妻子开口了。她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南湖风景幽美,游人少,好隐蔽。

代表们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这个党叫什么名字好?”

在这些代表中,灿若星辰的“南陈北李”却未参加“一大”。

当时,陈独秀在广州担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为筹集校舍经费奔走,一时走不开而未参加。关于李大钊的缺席,现在一种最主要的说法是,他当时作为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的负责人,因忙于领导索薪斗争而抽不出时间。

而实际上,北京小组成员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通知后,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在组织活动中就没有惊动李大钊。

“当时出席的人……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另一位骨干成员刘仁静在《一大琐忆》中说。

而著名的“南陈”,当时是很有些狼狈的。陈独秀自已被保释后,他就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离开北京必须汇报。

1920年2月,北风吹啸的阴历年底,正是北京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

一辆骡车从北京朝阳门南下。一壮年男子跨在车把上,头戴瓜皮小帽,携几本账簿。车内一中年男子头戴毡帽,身着厨师背心,满是油渍、料峭的寒风中,骡车向着天津急奔。

车上的两人就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号称“北李南陈,两大星辰”。

之前,陈独秀和李大钊交往甚多,但他们从没有过如此长时间却又深入的交谈。

“到了该建立共产党的时候了。”在这辆破旧的骡车上,两人讨论建党之事。

一路无人盘问,陈独秀安然脱险到达天津。李大钊即购得船票,陈独秀逃往上海。

到上海3个月,陈独秀秘密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传播“危险”思想,联络进步人士,结识陈独秀不久的李达、李汉俊等都参与了进来。

这年春天,一位身份特殊的俄国客人拜访了陈独秀。

来人正是俄共(布)远东局全权代表维经斯基,这个化名为吴廷康的“中国通”还带来李大钊的一封信。

李大钊对维经斯基此行介绍得很清楚:代表共产国际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了解中国革命发展的情况。

头陈行动很快就在这次会议后展开。1920年6月,一群“思想最激进、思维最活跃”的中国人,在维经斯基的参与指导下,酝酿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这个党叫什么名字好?叫“中国社会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又是一番争论。

陈独秀拿不定主意,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

“就叫共产党。”

随后,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北京等地陆续建立。

台子搭建好了,名字起好了,大戏就该上演了。

“一大”会议上的争论

因为年轻,也正是因为年轻,“一大”才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气质:争论。

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参加“一大”的15人(13名代表与共产国际2名代表)中,最年长的何叔衡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

巧合的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是所有人的平均数:28岁。

会议最初,气氛是平静的,后来,就开始了争论。

在第一个纲领中,第14条比较特殊。在俄文译稿中,表述为:党员除被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和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制。

想不到这个问题,竟引起了激烈的大辩论。

陈公博主张可以,他当时在广东担任“宣传员养成所”所长,陈独秀更是担任“广东省教育厅长”这类的大官。他们认为共产党员做官没有危险,还建议挑选共产党员做国会议员,但须在党的领导下工作。

第三次会议没有争出结果,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激烈。

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会把共产党变成黄色。为了不允许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

而另一方认为,利用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取得成就。

至于党员是否应该做官的问题,代表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当部长、省长,一般不应当担任重要行政职务,但可允许共产党员当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问题最后被推到了张国焘面前,他也拿不定主意,便让毛泽东、周佛海“把大家的发言都记录下来”。这次会议暂时不作结论,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

空前的开放氛围弥漫在“一大”召开过程中,不同意见的人都在争论,谁也不愿轻易让步。

无法预测的命运纠葛

私下里,几位代表彼此之间的评价,也有些微妙。

在王会悟的回忆录中,她认识的张国焘“星眉剑目,能说会道,灵活且活跃”。

在王会悟的回忆录中,她认识的张国焘“星眉剑目,能说会道,灵活且活跃”。

不绝地说教。”

张国焘对陈公博似乎有些微辞:“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大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

圆滑乖巧的张国焘还从李达、李汉俊处,察觉出与马林之间的关系不那么融洽。

在张国焘的回忆录里,“马林和李达也许是两个刺头,恰好碰个正着。(李达)对马林印象不佳,不愿意让他干预大会的事。”

陈公博对张国焘的印象也不见得有多好。

“张国焘说李汉俊是有问题的,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理论……我们在他家内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们偏要在他那里开会。”陈公博听了这句话黯然不答,“心想……我以为同志间应当相见以诚,相规以义才对,国焘这样做,简直是和汉俊为难,连同志的安全都不顾……”

陈公博还认为张国焘“不免趾高气扬,那时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唯俄国代表马令和吴庭斯基(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记者注)马首是瞻……”

对于这一点,张国焘倒有说法。他说自己对马林“也只将他当做一个顾问,并没有遇事向他请教,这些情形似乎使他感觉受到冷遇……”

“一大”上,张国焘很活跃,而毛泽东表现得稳重而沉静。张国焘是大会的主席,毛泽东只担任记录,且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党组织情况。

虽然交流不多,张国焘觉得“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争吵而开放的“一大”结束了,开得默默无闻,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几个人会相信这些人真会创造奇迹。

可历史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跟这些人开了玩笑。

“一大”代表中,陈公博和周佛海一生多灾,脱党后投入国民党,成为大员。但此后却叛国投敌,成为中国的二号、三号大汉奸,最终难逃一死,一个被枪决,一个病死于狱中。

张国焘后来投靠国民党,成为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敌人。82岁在加拿大老人院离世。

如同鲁迅所说,“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

王会悟和丈夫常见“白面书生”样子的毛泽东在博文女校走走想想,挠首寻思。李达后来回忆说,毛泽东苦心思索,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的人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书呆子”,“神经质”。

“殊不知,他正计划着回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本报记者 任鹏

无论历史怎样评判,“一大”代表和他们那一代人,都不会仅仅成为书页上冰冷的文字或者发黄的图片、灰暗的影像。

在嘉兴南湖边,我一直在冒雨走,走下那艘游船,我仿佛看见,90年前,这些人也从这里走下。每一个登船的人,在时空转换里,都会与他们擦肩而过。

“你们的力量足以摧毁一切吗?”我问。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民苦到了极处……必须建立农民组织和工人组织。”毛泽东说。

他又接着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总要拼命地向前!”

“同样是善意的,自由主义和命令主义哪个更重要呢?”我再问。

“如果领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执行计划……”毛泽东反驳说,“为了改造一个国家,国民必须刻苦自励,并且需要作出牺牲。”

“那么,为了获得以后的幸福,现在必须要牺牲吗?多等许多年又能如何?”我发出第三问。

毛回答说:“如果计较这类事情,那么社会革命的理想1000年也实现不了。我不能等,希望更早一些实现目标。”

我又来到陈独秀住过的上海,回到上海,他在武汉演讲的声音还犹在耳边。

“革命的教育力量究竟有多大?”陈独秀挥挥手,乡音浓重:“现在还没有到流血的时候,心理上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与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就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比这代人更早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

我明白了,最柔软的东西会最后留下,即使看不见,摸不着,难以理解。这就是信仰。



▲上海“一大”会场外景。(翻拍)

1921年

1921年7月23日—8月初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嘉兴南湖上的一艘游船里举行。

8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中国工会办事处)在上海成立。随后又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设立分部,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

11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发出通告,对党的组织、宣传工作作了部署。

主要参考书目

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2、《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

3、《“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史料选编》

4、《毛泽东早期文稿》

5、《毛泽东选集》(第3卷)

6、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传略》

7、《萧子升回忆录》和毛泽东一起行乞记

8、《张国焘:我的回忆》等。